

因未曾跟踪阅读,著有《花堡》《危城》《这里不是处女地》等长篇小说和《美神》《风雨菱花》等舞台剧的多栖作家杨廷玉,给我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他的吉林省作协主席的身份,以及《问鼎长天》《一村之长》《女人不是月亮》等电视剧作品。因此,读他的长篇新作《尊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没有先入之见,没有预知预判,但读后深朴又厚重的丰盈感觉,反而使我意外惊喜,令人格外震撼。

《尊严》之所以读来引人入胜,读后来意味深长,与作者在作品的写作中,注意由表及里的生活拓展和注重由浅入深的内蕴开掘密切相关。作品由买房、卖房、炒房、建房等环节生发出来的连环故事,径直走进北方戈城当下社会生活的旋涡与热点,揭示出房地产业与都市经济、官员政绩乃至官商纠结的深层勾连,并进而揭示各色人等的人生欲求与命运浮沉。商场与官场,情场与文场,就这样搅成一团,兰艾难分。由此显现出来的,是社会生活异动与人们心里波动两个层面的混沌与胶着,冲撞与淘洗。

从艺术表现的层面来看,《尊严》在对暗潮涌动的北方戈城的故事叙述中,虽然选取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依流平进地以情节推进故事,但却把一些常见的手法运作出了自己的新意,这既使作品在生活含量上增加了丰厚度,又使作品在故事层面上平添了可读性。如许写法上的花样翻新,至少在两个方面显而易见,也收效明显。

其一,故事的营构与展开,由一到多层次走向盘根错节。作品由戈城某高校教师虞子游购买“逍遥居”联体别墅开首,由买房中的小争执,引出了因有着市长叔公的背景而年轻气盛的规划科科长裘芮;又由装饰房子的需要,牵出来现代装潢公司气质非凡的女设计师李蔚;继而又由八面玲珑的“逍遥居”销售经理曹琪的穿针引线,相继扯出广泰房地产公司做事持重的总经理吕而泰和唯利是图的董事长臧广栋,以规划工程谋求个人政绩的戈城市市长裘开运,以及裘市长正在谋划中的民生工程宏伟蓝图,广泰公司臧广栋必欲拿下民生工程的勃勃雄心。由此,作者就由看似寻常的买房与卖房,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房地产业鲜为人知的内在肌理,拨动了戈城社会与经济生活中最为敏感的一根神经,各路人马围绕着即将上马的房地产业工程纷纷亮相,相互明争暗斗,一个由房子、票子和位子联袂而成的人性博弈与人生大戏,就此拉开大幕,徐徐上演。在这里,一切都是自然

大浪淘沙也淘金

□白 烨

而然的,但又走向了不期而然;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但却总是相互羁绊,人性之异变与世事之难测,都在这里得到了具体而微的展示与淋漓尽致的表现。

其二,人物的设置与塑造,由性格的相互映衬进行人性的深刻审视。《尊严》里最后登场的人物很多,即就主要人物而言,分属不同类型的就有:文人类型的虞子游、斯缪、李蔚、陈克;商人类型的臧广栋、吕而泰、曹琪、吴筝;官员类型的裘芮、裘开运、林霖;“二奶”类型的褚彦青、陈娇、花馨等。但男女人物众多,却相互并不重复,彼此区隔分明,其因就在于作者着力于不同人物的性格刻画与性格打造,写出他们形神兼备的独特个性,并在比照之中彰显其长短与得失。比如,同属文人类型也互为知己的李蔚与陈克,前者依凭着自己的实力稳扎稳打,在装潢界小有名气,而后者寄望于炒股走大运铤而走险,最终血本无归;因为生活理念的迥异,导致的结果也完全不同。同是房地产商人,吴筝与臧广栋也大相径庭,吴筝为人儒雅,行事低调,总是以做好准备的姿态等待适当的机会;而臧广栋则为人强势,做事张扬,为赚取最大利润总是不择手段,直至不惜作奸犯科,以身犯险。而同属男女情友关系,裘芮与花馨只求欲情上的相互慰藉,臧广栋与褚彦青只是利益上的相互利用,而虞子游与李蔚的倾心倾身,却是人格的衷心互赏与人品的内在吸引。因为各自关系的内涵有别,其最终的结果也是各有所归。前两对男女一旦遭遇不测便反目成仇,后一对情人虽身陷窘境仍相互守望。这种不同性质与不同关系的对比描写,既写出了不同个性的具体表现与细部差别,又写出了性情与人生的某种对应,性格与命运的暗中勾连。

由房产故事的渐进叙述和各个中人物的对比描写,《尊严》最终浓墨重彩托出来的是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物,一个直面现实的主题。这个卓尔不群的人物就是文人虞子游,这个直面现实的主题就是人的“尊严”。虞子游在故事全面展

开之后,感觉上好像退居了“二线”,但在与李蔚、陈克、吴筝等人物的种种牵连中不断从各个侧面呈现出来,这使他实际上总处于形离而神即的主角地位。虞子游在任职大学出版社由编书小赚一笔之后,不失时机地购得了一套“逍遥居”的豪宅,那是他要让即将回国的“妻子、儿子感到满足”,“履行做父亲和丈夫的双重责任”。但这个已走向小康的文学教师,骨子里却充满着传统雅士的清高和现代文人的清醒,无论是赚钱还是花钱,他都毫无快感,而且勉为其难,唯有帮友人排解困局,既毫不犹豫,也心甘情愿。陈克拿他的钱炒股失败之后,他并不怨天尤人;在装修材料窃窃私语之后,他也不气急败坏。大气的为人、大度的胸怀昭然若现。在与妻子斯缪、与女友李蔚的情感纠葛中,他也是既坚持自我,又尊重对方,一切都遵从自己与当事者内心深处的真情呼唤。由此,他不仅赢得了李蔚的衷心倾慕,也赢得了妻子斯缪的真理解。在商场、官场到情场都争斗不息又氤氲不明的戈城,只有卓有定力的虞子游是少数的赢家,而在这背后,则是他面对“物质和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圭臬”的社会现实,不随波逐流,力求“人格独立”的人生抉择。让人欣慰的是,特立独行的虞子游并不孤单,陈克由他这里看到了“心地善良,追求高尚”;李蔚由他这里看到了“胸怀和灵魂,毫无保留地袒露”的“真诚”与“可爱”;吴筝在他这里也看到了“人要有意义的生存”。由于他的存在与坚守,充满恶性的竞争因而不再浑浊的戈城这方天地,并没有完全倾斜和失去平衡,还在精神的层面上葆有一种对善的追求,对恶的抗拒的力量,不时地在乌云翻滚的上空闪现出一抹亮光来,这既给人以安慰,也给人以希望。

虞子游这个人物形象,以及他所饱含和传扬的“尊严”观,使作品以坚韧的正气、十足的大气,在其主要内蕴上攀升到了一个时代精神的制高点,在人物塑造上释放出了熠熠生辉的新亮点。这便使得《尊严》在当下的长篇小说之林中,别具其独特的价值与重要的意义。

掩卷回思,虞子游这个人物总在眼前晃动,挥之不去的有他纯真又娴雅的人格形象,更有他坚定又高远的人生理念。这一切既是当下文学作品中所少有的,也是当下的社会现实中所稀缺的,《尊严》有此独特贡献,作者杨廷玉功莫大焉。

杨廷玉长篇小说《尊严》:

一部充满忧患意识的生活乐章

《尊严》逼视当下国人心灵的困惑,通过一群都市浪子的命运起伏,谱写了一曲拼力冲脱物质牢笼的深沉激越的精神悲歌。这是关注现实、目光深邃的杨廷玉,自探询农村变革的《梦醒五棵柳》《花堡》及瞩目高技术、生态圈的《问鼎长天》《不废江河》之后,又一次重要的创作转折。

《尊严》以一组号称“逍遥居”的豪华楼盘销售与装修为聚焦点,引出北两房两家房地产公司的角逐,每一个家庭8年的分解,由此牵扯到民企与高官、房商与购房、老板与幕僚、雇主与员工、亲眷与情人等诸多人际关系。如果说,小说情节落脚于几桩命案,无情暴露出市场经济下金钱可怕的腐蚀性与毁灭力,那么,贯穿作品始终的精神心理剖析,则在鲜见的广度与深度上真切揭示了城市文明进程中人性在欲望与情操、迷失与清醒、堕落与高尚之间的挣扎,从而尽展杨廷玉独特现实主义追求的敏锐性与洞察力。

我觉得,《尊严》至少显示了以下三个特色:

一是中产“圈子”的探微揭秘,二是人生“尊严”的反复追问,三是精神危机的文化救赎。

当今的中产阶层,是小说的主要关注点。这个“中产”群体,官方的提法为“中等收入者”,是中国近年逐渐扩大、边界模糊的一个社会阶层。他们收入较丰、文化层次较高、社会地位变动较大,是伴随中国新经济增长的主体人群。描写此类人群的艺术作品日渐增加,但像《尊严》这样对从物质存在到精神神秘进行纵深式探究细察的,尚未多见。

关于“尊严”的追问贯穿全书始终。在杨廷玉笔下,这种人生价值的思辨,并不单单是抽象的理念,而是不同个性人物在其命运起伏的关头,各自灵魂的倾吐与剖示,是他们与物质生活相伴的内在精神旋律的奏鸣与交响。什么是“尊严”?作品中人物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小说抓住“尊严”问题,切中当今中国人人生矛盾的症结。笔者相信,在物质匮乏、境遇险恶的特殊条件下,人完全能够挺立起高贵的生命尊严、人格尊严。而《尊严》涉及的是经济发展年代的尊严问题,这就不可排除实现尊严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贫穷难有尊严。小说文本实际上触及了关乎尊严的两个范畴: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

《尊严》的情节呈现着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双行逆向的节奏和张力:前者,资金运作由旺盛、恣肆直至流失、酿祸;后者,人情心态由危机、纠结直至和谐、升

华。这透露出作者现实观察的思索轨迹。他为市场经济社会的物欲膨胀所造成的人性堕落而悲哀忧虑,同时又力图通过精神文化回归找到心灵救赎之途。

臧广栋、陈克等的物欲疯狂,曹琪、阿芳等的人格矮化,其精神疾患已病入膏肓。即便是虞子游、斯缪、李蔚,也都经历了一场痛彻肺腑的精神危机。这里,须先说说褚彦青这个人物。她是臧广栋在深圳包养的情妇,袖善舞,为臧出主意拉关系,一度成其得力助手;可又是她关键时刻的举报,把臧推入绝境。这是为什么?褚与臧的身世有点瓜葛——亲属都与那个中南局女高干关系密切——褚母是老干部的女秘书,文革受连累遇难。彦青被老干部的司机养大,受过某副省长的照顾,在养父车祸重伤时认识臧。臧有助于她给养父治病送终之恩,她又暗怀被臧下春药霸占之恨;臧的“猥琐、阴暗、刻毒”让她忍无可忍,“每天与孤独为伴,与痛苦为邻,与自卑为伍,丝毫没有点儿做人的尊严”。于是几经踌躇终下决心告发了他并服药决别这个世界。褚彦青应属小说中经历和性格最为复杂的人物,着墨不多,相当传神。她良知未泯,却陷入绝望,生命痛苦无从“救赎”而走向精神崩溃。她的悲剧命运,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市场漩涡中玩金者精神危机之深重。

作品主要笔力集中于虞子游、斯缪、李蔚的命运与心态的开掘,意在将精神危机救赎的希望寄托在人文知识分子身上,而且试图通过精神与物质的碰撞,以心灵重建、文化启蒙的方式实现精神的更新。由于文体相应加大了心理分析的规模,小说思想探索的流量、心灵世界的见度尤其令人瞩目。

改变社会风气,重建民族灵魂,是取决于国家政治经济战略的长远、浩大的工程。文化救赎的效能如何尚待观察,但它肯定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选择。“一切暂聚之形,只是一团虚影;有所欠缺之象,于此已变充盈;无可捉摸之事,于此已经完成;女性长存之德,引导我们上升……”歌德早已作古,可他那启蒙主义的神圣忧思,难道不会重启当代人的心扉吗?

小说封面上的话其实并不是问题,而是答案,也是用意,小说在写尊严——人的尊严,是把尊严当成一杆秤,用来称量生活中的每个人及其生命的重量,以及所有人生的价值和可能。所以说,作者实际就是在以自己对尊严的理解,及其基于某种“尊严”的写作,来力图重新申说何谓“人的尊严”以及“文学的尊严”。

尊严作为一个古老而又常用的词语并不难理解,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主要是指那种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崇高品质的东西,是在“人的尊严”的意义上对于“人的价值”的某种确认。不过在现实生活意义上,尊严经常体现为某种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充满张力的关系结构,即一方面是人与自我关系中的某种精神性的“自尊”,他们并没有感到任何的低下,是一种完全平等的精神交融。当虞子游失去了小楼,拿出12万给他们支付工钱时,这些家里千难万难的打工者,却毅然地放弃了工钱。还有那位深圳出租车司机,因为感受到轻视与伤害,而把曹琪半路赶下了车。在他的内心,尊严要比金钱更可贵。

《尊严》对现实的描述中,没有无可指责的完人,没有完美无缺的故事,有的是对人性的无情挖掘。作者的笔虽然是冷的,但心却是火热的。他刻画了阴暗,却揭示了光明。在让人纠结的无情描述背后,我们能够看到作者骨子里洋溢的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虽然作者在极力描述人们在物质异化下的无奈,但他的内心深处对爱情有着很多期待和向往。那是一种崇尚好人的情结。作者有意无意遵循着“好人好报”的传统伦理观,书中人物凡行善者有好报,做恶者皆遭难。在这种潜意识的期待与愿望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的道德观和理想观。

《尊严》将笔触直接聚焦于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内部,在官商纠缠的社会结构形态中,既展示了各种人性欲望的疯狂,演绎了灵魂失控后的种种灾难性场景,又彰显了纯粹的理想价值对于生命存在的支撑作用,也张扬了理性与道德复苏对于人生的重大意义。

直面繁杂而纷乱的现实社会,并最终回到生命的本源之中,既是《尊严》的叙事策略,也是创作主体的审美目标。小说从虞子游购买“逍遥居”的别墅开始,以一种看似不经意的方式,让叙事迅速挺进北国戈城的社会内部,展示了商界与官场、个人利益与经济发展、自我人格与情感欲望之间的复杂冲突。在那里,从海外巨富到国内商贾,都在凭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四处寻找商机;在那里,从市长公开到底层官员,都希望戈城能够在经济建设的浪潮中步入新的发展台阶;在那里,从个人的命运到情爱的归宿,都在不断地出现漂移和失控;在那里,从个体利益的攫取到彼此友情的维护,都呈现出空前的危机和失落……可以说,戈城的现实既是当今中国的现实,也是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处境。

在这种繁芜驳杂的现实处境中,作者围绕着“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这一暴发户式的利益集团,极力塑造了臧广栋、吕而泰、李蔚、裘芮等一大批人物群像,并以多头并叙的方式,将叙事延伸到国内外的广阔时空,使上至市长、下到普通的农民工,都获得了多方位的展现。这些不同的人物,其人生志向和价值趣味自然各不相同,生存境况与个体品性亦彼此相异。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正是藉此折射了当今现实中极为纷乱的人生镜像,它体现出杨廷玉的某种叙事雄心,试图通过这种广袤的叙事视野和庞杂的人物谱系,多层次、多角度地临摹中国社会进入市场经济之后的现实画卷。

尽管故事复杂且人物众多,但《尊严》还是体现了作家明晰而练达的叙事手段。从单元结构上看,它巧妙地设置了三组相对独立的人物群:一是以臧广栋为核心的商贾利益群,包括曹琪、张妙、褚彦青、吕而泰、王宗与覃妮、“长条”等。这组人物以商业利益与诡计谋为本,辅以家庭冲突和价值观冲突,形成了一种市场暴发户式的冲突群。二是以虞子游、李蔚、吴筝、斯缪、周天佑、陈克等为主的群体,同时兼及梁老五等一群装修工。他们以情爱、家庭和同学作为纽带,形成了一种以情感冲突为主、经济冲突为辅的人物群。三是以裘开运和裘芮、何芳等为主体的官场人物群。他们在家庭血缘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以官商纠葛为主、个体心态冲突为辅的人物群。尽管这三组人群的内部存在着各种难以厘清的矛盾,但他们彼此之间又紧密地交叉在一起,从而构成了整个故事盘根错节的网状结构特征。

在这一相互交织的结构中,作家让每组人物单元沿着自身逻辑发展的脉络,通过其核心人物的命运结局来凸现创作主体的审美思考。譬如臧广栋,虽然精明过人、胆识过人,手段过人,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谓不择手段——阿谀奉承,声东击西,过河拆桥,杀人灭口,但最终仍然逃脱不了最死之命;而吕而泰夫妇却以诚实本分的做人原则,成功地躲过了人生的劫难。虞子游等人虽然在友情和爱情的泥沼中四处突围,个人的欲望与理智的搏斗从未消停——无论是吴筝、虞子游与李蔚之间的情感,还是斯缪与周天佑之间的情感,抑或梁老五等装修工的监守自盗——但他们最后都在理性和道德的管束之下,赢得了各自内心的宁静和生命的尊严,只有陈克因为投机的失败,在友情伦理的巨大压力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最耐人寻味的,或许要算裘开运一家。无论是妻子何芳的自杀,还是侄子裘芮的暴毙,他们既为贪婪欲望付出了最终代价,也是家庭声誉与尊严的牺牲品。而作为一市之长的裘开运,一生产守中庸之道,尽管人们对尊严有着各自不同的诠释,但对他而言,尊严就是仕途。“说白了,他想当官,想干事。”所以,他虽然不是什么清官,但他内心深处依然保持了为民做事的道德底线。这种底线,其实也是中国社会赖以发展的重要基石。可以说,它既隐含了作家对当今政治体制的精确洞察,也传达了他对社会发展的深层忧患。

我之所以强调《尊严》的核心意图是“化繁为简”,就是因为在这述这些人物群中,很多人物命运的灾难性结局,从本质上体现了杨廷玉内心深处的价值旨归,即一种摆脱喧嚣与繁华,重返单纯与宁静的人生理想。所谓“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这是作者在小说中反复强调的一种价值理想,也是我们摆脱现实困境的一条重要路径。“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虞子游曾用苏东坡的这番言辞,表明了自己在历经各种波折之后的人生体悟,也婉转地传达了创作主体所遵奉的这一人生至理。

遗憾的是,《尊严》里的众多人物,却无法恪守这一人生至理,他们不断地奔波在各种诱惑的路途上,看似在为自我的尊严而打拼,绞尽脑汁,虚与委蛇,最终却常常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不错,在此如纷乱的现实秩序中,“各色人等生存境遇不同,对实现尊严的路径也有天壤之别”,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与尊严画等号的就是一长串物质概念,或者一长串精神概念。也正因如此,人生才显得如此丰富,生命才显得如此复杂。但是,在《尊严》中,我们又清晰地看到了另一类成功者的身影,如吴筝、李蔚、斯缪、周天佑、虞子游等充实而温暖的人生。在这群人中,内心之爱远高于本能欲望,友情和亲情远高于个人利益,商业信誉远高于人际诡计,所以他们的成功不仅是商业上的,更是尊严上的。

为尊严而活,并活出自身的品格魅力和精神操守,这是我们每一个稍明事理的人都非常清楚且时时面对的生活真谛。然而,这一切却被繁华的物质文明和无止境的欲望诱惑搅得混乱不堪。这使我们活得潇洒而又沉重,雄心勃勃而又小心翼翼,光鲜亮丽却又疲惫不堪。这是现代性的困境,也是我们无法逃脱的命运。《尊严》在直面这一令人尴尬的生存境域时,以一种剔肉削骨、撇花留香的方式,再现了人格操守与尊严之间的本质关系。

精神危机的文化救赎

□朱 晶

华。这透露出作者现实观察的思索轨迹。他为市场经济社会的物欲膨胀所造成的人性堕落而悲哀忧虑,同时又力图通过精神文化回归找到心灵救赎之途。

臧广栋、陈克等的物欲疯狂,曹琪、阿芳等的人格矮化,其精神疾患已病入膏肓。即便是虞子游、斯缪、李蔚,也都经历了一场痛彻肺腑的精神危机。这里,须先说说褚彦青这个人物。她是臧广栋在深圳包养的情妇,袖善舞,为臧出主意拉关系,一度成其得力助手;可又是她关键时刻的举报,把臧推入绝境。这是为什么?褚与臧的身世有点瓜葛——亲属都与那个中南局女高干关系密切——褚母是老干部的女秘书,文革受连累遇难。彦青被老干部的司机养大,受过某副省长的照顾,在养父车祸重伤时认识臧。臧有助于她给养父治病送终之恩,她又暗怀被臧下春药霸占之恨;臧的“猥亵、阴暗、刻毒”让她忍无可忍,“每天与孤独为伴,与痛苦为邻,与自卑为伍,丝毫没有点儿做人的尊严”。于是几经踌躇终下决心告发了他并服药决别这个世界。褚彦青应属小说中经历和性格最为复杂的人物,着墨不多,相当传神。她良知未泯,却陷入绝望,生命痛苦无从“救赎”而走向精神崩溃。她的悲剧命运,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市场漩涡中玩金者精神危机之深重。

作品主要笔力集中于虞子游、斯缪、李蔚的命运与心态的开掘,意在将精神危机救赎的希望寄托在人文知识分子身上,而且试图通过精神与物质的碰撞,以心灵重建、文化启蒙的方式实现精神的更新。由于文体相应加大了心理分析的规模,小说思想探索的流量、心灵世界的见度尤其令人瞩目。

改变社会风气,重建民族灵魂,是取决于国家政治经济战略的长远、浩大的工程。文化救赎的效能如何尚待观察,但它肯定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选择。“一切暂聚之形,只是一团虚影;有所欠缺之象,于此已变充盈;无可捉摸之事,于此已经完成;女性长存之德,引导我们上升……”歌德早已作古,可他那启蒙主义的神圣忧思,难道不会重启当代人的心扉吗?

“人的尊严”与“文学的尊严”

□张文东

了一对时髦男女“以衣帽取人(实际上是以财富取人)”与主人公自守并自豪的精神世界之间的冲突,并由此结构出了以“尊严究竟由何而生”为核心的叙事逻辑,而其后种种,虞子游这颗定盘星便不仅用尊严称量着自己,也称量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其实,按照这样一种具有两分和对立的叙事逻辑,当故事中的所有人都在这杆“尊严”的秤上称量自己的时候,读者也和他们一起站在了同一杆秤上,始终面对并追问着共同的问题——人的尊严究竟是什么?在哪里?又如何才能获得?

不过在我看来,谁来回答或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不是多么重要,反倒是否能提出这些问题才更有价值和意义。所以说这部作品最大的价值之一,也许就是在它可能让我们重新拾回了一个问题:一个在现实中可能被我们遗忘了许久的问题,一个直接指向现实社会物质化生存痼疾的问题,一个关于我们自身生存与生命永远都不应该回避的问题——人究竟何以为人?何以自处又何以自审?当然,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是没

有尽头的,想要在一部小说中获得所有答案也是不可能的,但至为关键的是这样的问题必须要有来人关注、发掘、思考。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才给我们来了一个更大的关于“文学的尊严”的思考。